

刘敦愿 著

刘敦愿文集

上卷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刘敦愿先生所著 115 篇文章,按照论文内容编排为上下两卷。上卷为美术考古,收录 56 篇文章,分为古代艺术与理论、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艺术与纹样母题、汉代绘画艺术、考古调查与研究五个部分;下卷为历史与文化,收录 59 篇文章,分为东夷古国与齐鲁文化、古代神话与国族、古代环境与动物、民俗与民间艺术、其他五个部分。

本书适合历史、考古、美术、民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爱好者和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敦愿文集:全2册 / 刘敦愿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3-034873-9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8855 号

责任编辑:刘 能 / 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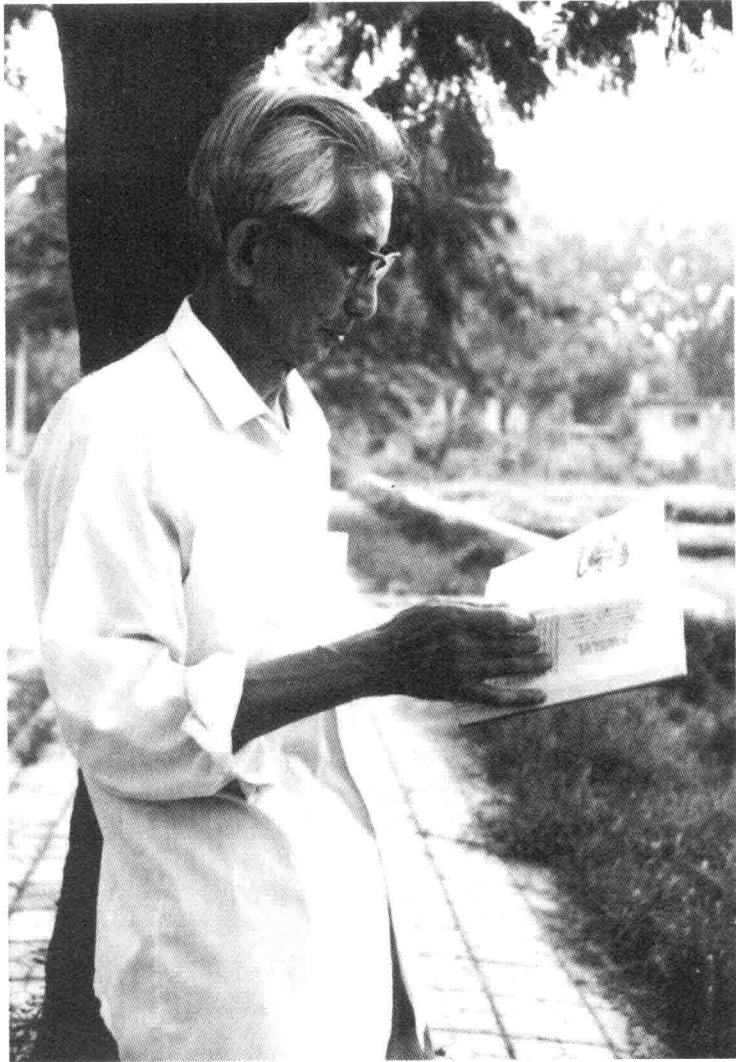
2012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6 3/4

字数:1 320 000

定价:2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刘敦愿（1918～1997），湖北汉阳人，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1939～1944年就读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师从秦宣夫教授学习绘画，又师从丁山教授学习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毕业后曾在四川省图书馆等单位工作。1947年应聘于山东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历史系执教。1972年在该校历史系创建考古专业（今考古学系）。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山东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会长，以及中国农史学会、山东历史学会、山东省博物馆学会顾问等职。

刘敦愿先生早年致力于山东地区田野考古调查，积极组织考古发掘，对于建立山东早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有重要贡献。其著述侧重于中国古代史、史前考古学与商周考古学等方面。晚年则专注于美术考古研究，针对史前陶器艺术、商周青铜艺术、东周与汉代绘画艺术，以及有关理论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重视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互证，重视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的结合，重视从多方面发掘考古学材料的学术价值。其研究领域还涉及古代神话、古代民俗、民间美术和科技史等多个领域。

目 录

一 古代艺术与理论

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	(3)
中国早期的雕刻艺术及其特点	(13)
商周时期的象形文字、纹样与绘画	(24)
说“文”与“文字”	(37)
天圆地方思想的起源及其艺术表现形式	(41)
试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	(48)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	(57)
中国古代动物画艺术中的细节表现	(67)
论古代仿匏器皿及其艺术构思	(72)
《考工记·梓人为筍虞》篇今译及所见雕刻装饰理论	(80)

二 史前陶器艺术

论鹳鱼石斧图的艺术性及其他	(95)
彩陶盆舞蹈纹样研究	(100)
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	(108)
宁阳磁窑鸟形陶鬲	(113)
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	(115)
岳石文化的陶器艺术	(132)

三 商周青铜艺术与纹样母题

青铜器装饰因素与纹样含义	(143)
饕餮(兽面)纹样的起源与含义问题	(151)
夜与梦之神的鸱鸃	(159)
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鹰崇拜	(172)
含义复杂的中国古代虎崇拜	(181)
作为财富象征的牛纹与牛尊	(192)
湘潭豕尊与古代祭祀用豕	(199)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鹿类描写	(207)
神圣的昆虫——蝉纹研究	(216)
青铜器勾连纹探源	(226)
圆涡纹与《考工记》的“火以圜”	(230)
鸡卣与鬲尊	(238)
鸟兽纹觥装饰艺术分析	(242)
论青铜器动物纹饰的对称法则问题	(246)
试论中国青铜时代艺术中的东方史前文化因素	(259)
关于战国青铜器画像问题的若干思考	(271)
青铜器上的狩猎图像	(280)
青铜器采桑图像的主题思想商榷	(291)
舟战图像小议	(295)
古代庭园植树与观赏养鹤	(299)
大武舞戚图像问题再议	(303)
试论战国艺术品中的鸟蛇相斗题材	(306)
铜鼓上的牛鸟纹样	(317)

四 汉代绘画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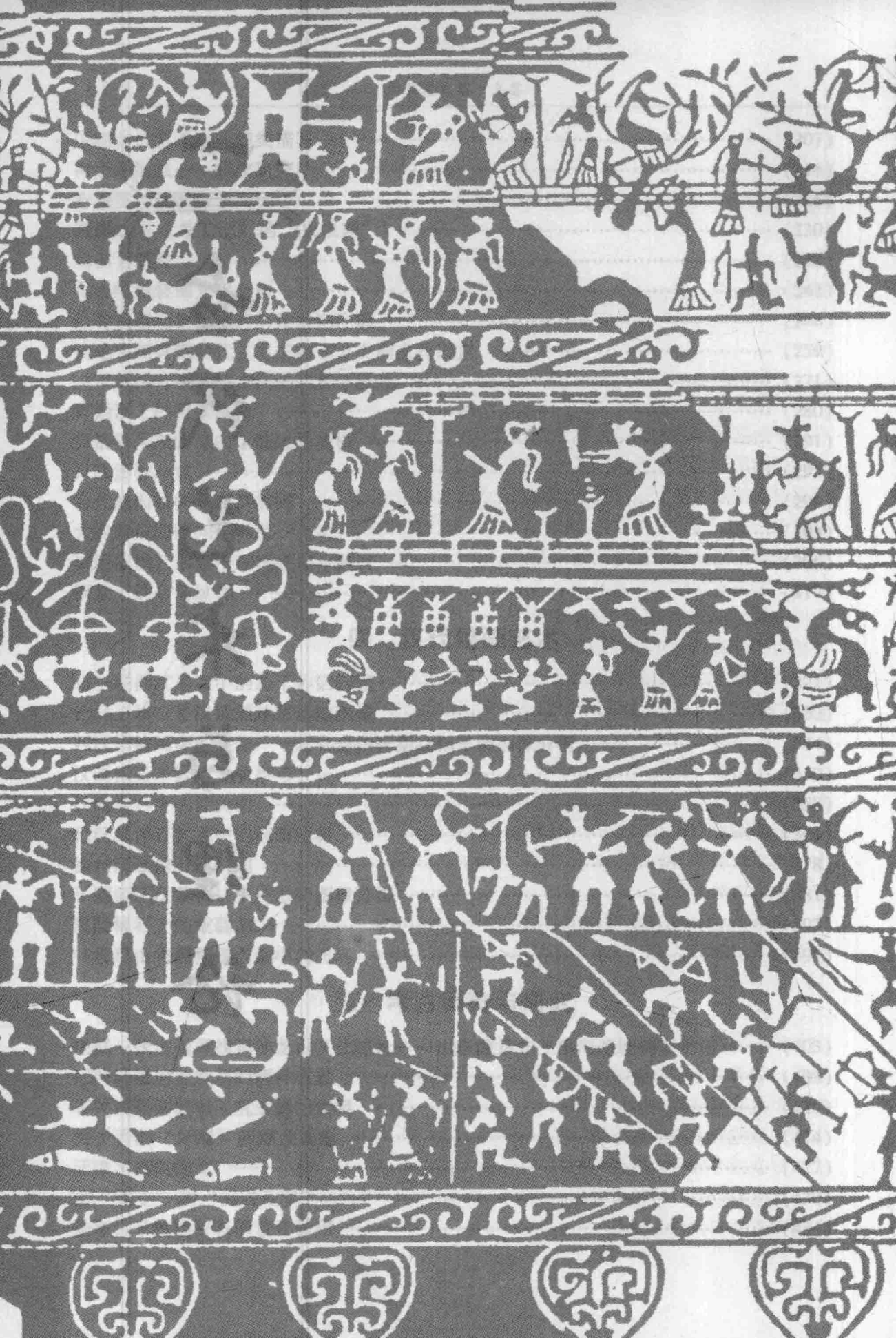
马王堆西汉帛画中的若干神话问题	(321)
论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棺图像	(332)
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分析	(344)
汉画像石未详历史故事考	(350)
汉画像石中的针灸图	(358)
论汉画像石艺术中的庖厨题材	(364)
徐州汉画像石秣马图	(378)
平阴孟庄汉墓石柱祭祀歌舞图像分析	(381)
汉画像石上的蹴鞠图	(393)
甘肃黑山岩画狩猎图像中的飞鸟	(397)

五 考古调查与研究

根据一张古画寻找到的龙山文化遗址——山东胶县北三里河遗址调查小记	(403)
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	(408)
有关日照两城镇玉坑玉器的资料	(410)
关于香港“牙璋”问题及其他	(414)
牙璋与商代铜戈	(427)
论“圜土”和“因戍致罪”	(430)
论考古学痕迹资料的重要作用	(434)

一

古代艺术与理论



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

一、古代造型艺术作品是实物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的史料来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科学。这种实物的史料，既然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因而它所包括的种类，所表现的形式，也就出人意料地复杂。一般反映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遗物遗迹，最为丰富也最为常见，这方面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无须一一列举。此外，还包括两个重要的部类，即各个时代，不同种类与形式的古代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其内容相当复杂，并且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们很早便开始重视它们，并对其进行搜索与专门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古代艺术品，主要是指造型艺术，即具有形体，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两度的与三度的），诉之于人类视觉感官的艺术，如建筑、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等等。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没有形体，完全凭借听觉，使艺术形象在时间进行中展开与完成。因此，古代的音乐必然是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永远不存。考古也能发现各种各样的乐器，然而这只是演奏者使用的器具，不是古代音乐艺术本身。至于古代绘画、雕塑所见乐工演奏时的描写与乐队的组合，严格来说，那也不过是以此作为题材，仍属于造型艺术而不是时间艺术；关于综合艺术（时空艺术）的舞蹈与戏剧，地下出土情况也大体如此，所能保存下来的，只是演奏者、表演者的服饰与妆扮，刹那间的动作与表情，舞台布置与人员组合。对此，结合古代文献记载进行考察，从观念上给我们许多有用的知识。对于在时间进行中展开与完成的艺术方面，则是无从再现了。

古代艺术品，无论是保存于地表的还是埋藏于地下的，可以移动的还是不可移动的，它们既是艺术品，同时又是一种实物史料，尤其是其中具有写实性的作品，更是一种很难得的形象性的记录。由于古代艺术品的这种两重性，因而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量事实证明，在较早的时期，两者便曾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关系相当密切。在今天，各门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及其领域内的各门学科，彼此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协作，关系的密切程度，更是前所不见的。因此，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仍然值得重视，应该继续予以探讨。现在我想就此谈谈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二、在欧洲，古典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是现代考古学的先驱

这里所说的考古学，指的是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即以田野考古方法作为基础的考古学。这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19世纪中才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从它的酝酿时期算起，恐怕又是目前所知各种学科中历时最为长久的一种。这是因为，自发性的考古活动很早很早之前便已有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遗迹，自古迄今屹立于地表，予人深刻的印象，而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的种种活动，也使埋藏于地下的遗物随时随地有暴露出来的可能。它们促使人们对此做出必要的解释，其中既有荒诞无稽的附会，也有某些简单的合理判断。这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后来，情况有了发展。就中国说是近千年以来，就欧洲说是近五六百年以来，古代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两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这种研究，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方法上都很不科学，很不全面。然而，现代考古学却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代铭文资料是古代直接遗留下来的书面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内容的广泛与价值的重要都毋庸置疑。古代艺术品是往昔各时代、各民族知名的或无名的艺术家的创作，是早已失传的艺术创作。它们的形式、风格、流派都很复杂，是一种古老而又“新鲜”的文化遗产，对于今天也具有非凡的魅力。由于这两个部类的重要性与相对的独立性，它们首先受到重视并很早专门成学，这一点东方与西方也都没有两样，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东西方的侧重点却不相同，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铭文资料特别丰富，文字未曾实现拼音化，结构相当特殊，书法又成为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因此，金石文字之学的研究开始得很早，远在宋代便已专门成学，清代更有较大的成就。对于古代艺术品，唐宋时期对于壁画与汉画像石也有搜集与探讨^①。但总的说来，无论是出土的遗物还是保存于地表的遗迹，却从未被作为重点研究过；宋元以下，建筑、壁画、雕刻也都被鄙薄为工匠之事。虽然原因有待探索，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②。

欧洲的早期考古研究则几乎完全相反。古代希腊、罗马是欧洲古代文明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遗留下的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都非常丰富。但文字是拼音的，因而有语言学而无文字学，对铭文资料虽很重视，却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占有如此巨大的比重；

^① 汉武氏石祠画像最初见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南宋洪适《隶释》、《隶续》中，又分别著录了部分题榜与图像。壁画研究见本文注^⑦。

^② 本书《中国早期的雕塑艺术及其特点》一文，曾论及中国雕塑艺术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可供参考。

而古典时期的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艺术品的发达与成就的辉煌，却又是世界他处所难以企及的。后来，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人们对古代“异教徒”的文化艺术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15世纪起，以意大利为中心，人们开始了对古典雕塑艺术品的搜集，最初主要在罗马与意大利的几个大城市，后来影响及于法、德等国，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时尚。这种情况与中国宋代以来金石学家热心搜集钟鼎彝器非常相似，都是根据传世品与通过收购方式得来的乱掘品，进行孤立的片面的研究。不过，欧洲的早期考古活动是从美术考古开始的，走的又是另一条道路^③。

无论是中国的金石学，还是欧洲早期关于古典艺术品的研究，较之在此之前的种种偶然性、自发性的考古活动，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考古学想要形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只有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才有可能。从古代铭文与古代艺术的研究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化，在中国与欧洲，机会都是均等的，但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与百余年来沦为半殖民地，文化科学非常落后，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才从欧洲引进现代考古学。欧洲则不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优越，科学的先进与文化事业的发达，最初从古典艺术的研究出发，后来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终于突破了原来的种种局限，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这个转化过程完整而且脉络分明，可以作为典型来说明。

从15世纪兴起的关于古典时期的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内容很贫乏，方法也是落后的。到18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 J. Winckelmann, 1717~1768年）作意大利旅行，实地考察未经组织起来的雕塑艺术资料与保存于地表的古代希腊与罗马的建筑，比较不同时代建筑与雕刻风格的差异，从此改变了过去根据有限的搜集品进行文献考证的方法。这在考古研究上是个重大的进步。温克尔曼是公认的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考古学调查方法首先由他应用于古代艺术的系统研究，而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Geschichte der Kunt des Altertums*）一书书名也冠以“考古学”（*Alterlumskunde*）一词。这说明，即使到18世纪中叶，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④。

在欧洲，最初所谓考古学，实际上还只是古典考古学，包含的时限是公元前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内容主要是古典时期的铭文资料与造型艺术，范围非常狭窄。但是，到了18与19世纪之交，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考古学开始了巨大的迅猛的发展。在19世纪，有关古代的知识空前丰富起来，“考古学”不再是“古典考古学”的同义语，而是具有非同一般的丰富的内涵了。

考古学所探索的时间大大向前延伸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本身既有个发生、发展的前奏，而且也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对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地区的调查与发掘，它的上限提到了公元前3000年与公元前4000年；借考古学之

^③ [德] 亚尔多夫·米海里斯《美术考古一世纪》第一章“至十八世纪末关于古代美术品的知识”，中译本，群益出版社，1948年。

^④ 同注^③。

助，人们开始知道，文明时期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史前时期，因为还没有文字，必须依靠使用的工具区分时代，而石器时代太长，还要再做区分，并且动辄以万年作为计量单位。

在活动的区域方面也有很大的扩展：古典艺术研究与古代考古学虽以古代希腊、罗马作为研究对象，而希腊本土因为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下，遗物遗迹还不能普遍为人所知，直到19世纪才补足了这方面的缺陷。史前考古学的兴起，使得古代希腊、罗马之外的广大欧洲地区得到考察；古代希腊殖民地的考古、古代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使考古活动范围扩展到了西亚与北非地区，超出了欧洲之外^⑤。

19世纪的考古事业如此规模地普遍展开，使得考古学研究对象变得非常复杂了。除了继续发现更多的、更为系统的古代铭文资料与古代艺术品之外，还有关于古代的生产与生活方面的遗迹与遗物，后者在数量上多得难以数计，其种类与形式的复杂多变更是令人无从预料。过去认为无足轻重的种种普通物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过去那种有“选择”的“挖宝”式的错误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了。科学地认识地下现象所反映的丰富的历史事实，需要完善的、科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解剖式的考古发掘、如实地记录遗物间的共存关系、严格区分地层先后叠压次序以及遗迹间的互相打破关系，后来又发明了依时代顺序作器物演化研究的形制学方法（typology，也译作标型学或类型学），等等。在今天这已是一般专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准则，并逐渐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在19世纪中，这些方法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就世界文化的发展而论，这也是经历了悠长岁月的探索，而后取得的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这种科学的方法一经普遍的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完善，立即使得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为之改观，以致今天一个青少年所获得的知识，就连古代最为渊博的学者也要感到羡慕了。

三、现代考古学推动了古代艺术研究的迅速发展

从欧洲文化史的发展来看，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既得力于古代艺术的引导，又否定了古代艺术在考古学上的优越地位，但是，这并没有削弱或妨碍对古代艺术的研究，相反的是加速了这方面的发展。

第一，有关的研究资料空前而且急剧地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一般问题的探索还是对专题研究的深入，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古代艺术品与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资料，都是人类过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共同依存从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凡是进行过田野调查发掘的地方，除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以外，各个时代的艺术品自然也就

^⑤ 除米海里斯所论而外，〔苏〕兹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中译本，三联书店，1984年）对南欧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考古有详细介绍，可供参考。

会伴随出土。这方面的研究不再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与时代，而是遍及世界各地，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做更全面的探索了。另一方面，古典艺术研究不得不再依时代、地区与民族做更细致的划分，从而进行专题的、深入的研究，不断充实、丰富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内容，而这些断代、区分、专题的研究，也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做全面的考虑，才能历史地、全面地有所了解与评价，彼此是相辅相成的。考古发现的日新月异与研究工作的日益深入发展，不仅要求历史工作者、考古学者必须密切注意新的种种发展，就是古代艺术研究方面，也同样要重视有关讯息与动向，以免使工作失误或受到局限。对于这个问题，古典考古学艺术研究的前后变化，是最显而易见的：从15世纪以来，古代铭文与古代艺术的研究便已开始，貌似极盛，实际上内容贫乏，知识有限，发展十分缓慢；真正的发展在19世纪，在希腊本土及其附近的岛屿以及小亚细亚与黑海沿岸得到充分的调查与重点发掘，埃及与意大利考古事业兴起之后。以雅典帕特农神庙建筑与雕塑群为典型的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艺术的发现引起整个欧洲的震惊：绘画艺术因无保存曾是个薄弱环节，后因意大利境内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考古文化中古希腊壁画与大量陶器上的“瓶绘”的发现，开始获得了补偿，证明作为雕塑的姊妹艺术，当时也同样卓越；迈锡尼文化的发现，把希腊的历史研究引向了它的“英雄时代”，并使人们看到它与古代埃及文化的影响；中亚考古与印度佛教考古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马其顿帝国强大之后，“希腊化时代”的文化影响传播到了东方，等等。古典时期的历史与艺术，因现代考古学而获得更系统全面的研究。如果把现代考古学放在世界文化历史中再作科学的分析与比较，它的成就便更显得光彩夺目。

从欧洲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来看，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这不禁令人联想到这样一件事情：郭沫若先生曾译德国著名学者亚尔多夫·米海里斯（A. Michaelis, 1835~1910年）《美术考古一世纪》（*Ein Jahrhundert Kunstärcheologischer Entdeckungen*）一书。在《译者前言》里，他追忆1929年旅居日本时，一度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当时需要必备考古学知识，但郭氏开始学习时，不是译读一本考古学通论，而是这本关于古代艺术研究的专著，并且认为获益匪浅，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

如果以中国为例，现代考古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更为显著了。中国早期的考古研究以金石文字为主，对古代艺术的研究原本微弱，而古代艺术的研究又只注重绘画与书法，而且绘画只重卷轴而鄙薄壁画。这种封建的狭隘的美学观的长期统治，既妨碍古代艺术研究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国家套取与窃夺中国珍贵文物大开方便之门。在中国，我们对于许多重要的具有双重价值的遗物遗迹居然视而不见，毫不珍惜，而在外人眼里中国却遍地是宝，恣意巧取豪夺，为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考古学与改变我们传统的美学观方面，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较之欧洲几乎迟了一个世纪之久。20世纪以来，前50年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年代，后40年，中国的考古事业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非常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为科学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提供了基础，这已是众目共睹的事实。

第二，社会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因此，一切艺术的研究必须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结合起来，互相说明。现代考古学强调地下出土资料的完整性，把古代艺术品看做共存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各种遗物互相印证，反对过去那种只重艺术品而舍弃一般遗物的错误做法。为此，必须把古代艺术品同产生它们的特定的社会土壤与历史条件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为古代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科学基础。现在可以选择几个例子来做说明。

在人类的成文历史之前，还曾有一个漫长的史前时期，这在今天已是一般的常识，可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并不清楚。因此，在法国与西班牙最初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与小型雕塑品的时候，人们为其中野生动物造型及其动态的生动优美而感到震惊，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若干万年前的艺术创作，而一度被误认为是近代好事者的作伪。考古发掘研究与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多种科学的协作证明，艺术的起源诚然不是从人类的形成、史前史的开端就与之俱来的，但是，在数以百万年计的岁月中，逐渐健全起来的思维能力，日益敏捷灵巧的双手，把丰富的狩猎技术所培养出来的观察能力移之于艺术创作方面，因而便产生了上述的奇迹。多处与这类壁画艺术共存的洞穴堆积中，出土的真人骨骼、冰川期的动物化石、各种制作精巧的打制石器与骨器，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说明它们时代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借助于现代科学的考古方法，这个问题恐怕是一时很难弄得清楚的。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风格转变了，写实的狩猎图像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陶器装饰艺术，这一特点带有世界性。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技术与艺术之精美，往往是后世所难企及的。例如，中国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与龙山文化中的标准黑陶，在发现之初，假若它们不是与石器共存的话，人们竟不敢判断这是史前时期的制作。之所以如此，应是原始农业出现后，使得定居的或相对定居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在金属发明及其普遍使用之前，陶器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前生活的单纯，使得人们将聪明才智都倾注在陶器的技术与艺术方面。这是只有考古发掘才能发现的事实，也是只有考古研究才能说明的问题。

对于史前艺术的研究是如此，对于文献记载所不详的时代、地区与民族的古代艺术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与中国的商周时期，以及活动于欧亚大草原上的一些古老的民族，有关他们的遗物遗迹，尽管很早便有发现，甚至某些精美物件的搜集相当宏富，但对于这些时代、地区与民族的古代艺术却长期难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必待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后，对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具备了一定的了解，才能进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考古学相对年代与形制学方法的普遍应用，对古代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

史料必须赋以精确的年代才能运用。年代不外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两种，并且互相结合。这对于任何历史学科的研究都是需要的，考古学自不例外；而更多地、更经常地运用相对年代，则成为考古学的特点。

考古学上的绝对年代，过去主要依靠铭文资料来推定，但这只能用于文明时代，

而且这样的幸运往往十分难得，对于史前期则无能为力，但在考古发掘中，文化层的叠压与遗迹的互相打破，自然会使遗物呈现出先后与早晚的差别，这类科学发掘越丰富，相对年代的关系也就越系统越精密。这不仅对于史前考古有利，即使对于文明时代的考古也同样是非常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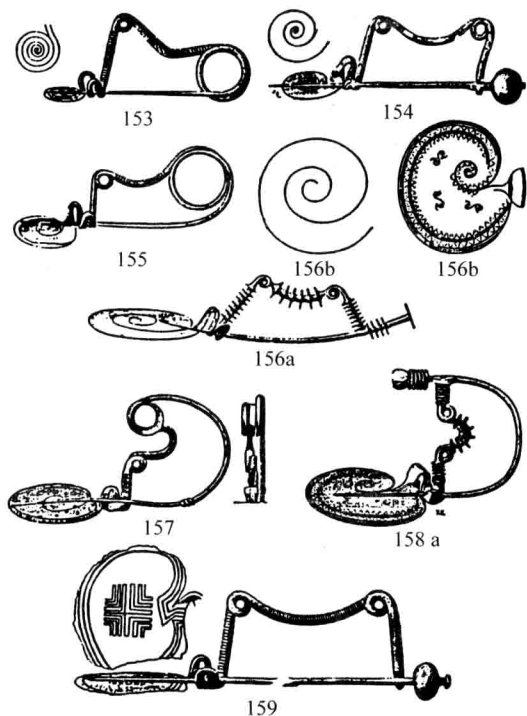
古代艺术品本身就是实物史料的一个部类，用之于形制学方面的研究，解决考古文化中相对年代问题，较之一般常用器皿，往往更是特征鲜明，富于变化，并且饶有兴味。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制学的创始人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就曾以欧洲史前的兵器、容器、扣针，古代埃及纸草纹样的形制演化，来研究不同文化系统年代学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范例^⑥（图一）。在今天，这方面的例证就多得不计数了。

从古代艺术研究的角度来考虑，这类形制学的研究不但为前者搜集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将其科学化与系统化（排列出精确的年代顺序、不同地区或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种种差异、不同的文化体系间的互相影响，等等）。虽然目的不在于古代艺术，然而却为分门别类的系统的艺术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坚实基础。

前面提到的蒙德留斯的研究是如此，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有新石器时代各地区陶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器形与装饰艺术、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研究也是如此。古代艺术品既然具有艺术的与史料的两重性，有关研究的深入必然会与考古学的发展同步进行，这在形制学问题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四，古代艺术资料的大量发现与相应研究的不断深入，并通过博物馆、展览会的经常性宣传，对于改变社会审美观念，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所经常接触到的只是近几百年间的古代艺术与审美观念。这些艺术与有关思想对于现今的艺术创作欣赏往往产生重要的影响。古代文学方面的文化遗产，由于它们是语言艺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保存下来，而且数量也较丰富；至于艺术方面的文化遗产，由于它们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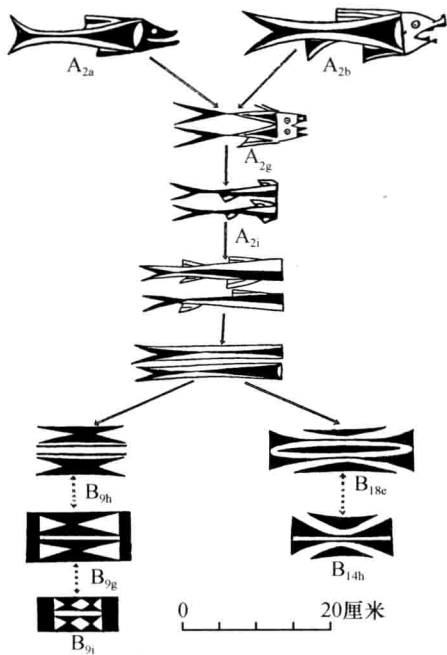


图一 北欧史前扣针形制演化

^⑥ 蒙氏论点及形制学研究举例，见所著《东方与欧洲的古文化诸时期》一书的“方法论”章。此书有滕固译本，改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

凭借形象作为媒介，以实物的形式而存在，所以除了个别的遗迹还较完好地保存于地表，少量传世品尚能幸存于人间而外，十有八九都已毁灭与埋没。因此，大量艺术性的遗物出土及其日益系统化，虽然是旧日的事物，却给予我们崭新的印象，不断地扩大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并能对于社会风尚的改变发挥一定的作用。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基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从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就显得更加迫切。目前，我们所习见的只是明清以来的古代艺术品与工艺品，在社会上占主导的是近几百年中所形成的艺术创作思想与欣赏爱好。这些思想与文化艺术产品中固然包含许多优秀的成果与有益的养分，但是，如果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放在世界范围里加以考察，显然已经流于纤巧与单薄。在艺术风格方面，从史前开始的，经历商周、秦汉、六朝以迄唐宋，那种雄浑、典雅、不断创新的势头已经遏止，再也难见那种百泉迸发、群芳争艳的生机。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艺术伴随着古老的



图二 陕西西安半坡彩陶鱼图案演变

封建社会已走到它的尽头，不向世界各国学习，取长补短，补充新的血液，是无法扭转这种颓势了。认识到这一点是继洋务运动之后，特别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觉醒。这自然是正确的，就横向来看也是如此。然而单纯的横向学习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作纵向的学习，对历史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探讨，汲取丰富的营养，变腐朽而为神奇。20世纪30年代，我们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例如汉画像石艺术曾受到世界性的重视，其中武梁祠画像石的某些场面或画风曾给予装饰艺术强烈影响。近几十年来，古代陶器、青铜器装饰艺术、汉唐壁画艺术首先影响于工艺美术，后来也影响到绘画、雕塑以及美术片的创作，等等^⑦。这说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僻处边远地区与埋藏地下的古代艺术渐为人知，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图二）。

⑦ 中国南北朝隋唐以来，壁画艺术居于主导地位，较早期绘画史论著作有明确记载。五代与宋代余风还有残存。灭佛运动与兵火战乱危及寺庙，也常见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移壁抢救。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记》（《会昌废壁》）两书，资料比较集中；宋康与之《昨梦录》也曾记：“国初修老子庙，（按，庙在洛阳邙山上），庙有道子画。官以其壁募人买，有隐士者，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对于著名雕塑也有类似情况，如宋王鞏《闻见近录》说：“司农寺请鬻祠庙，每躯若干钱。张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闻于神宗，大骇之。”可见移壁移像之事，不自斯坦因、勒柯克之肇始，中国古已有之。不过前者为了拯救国家文化遗产，后者则在盗窃他国文物，性质完全不同。